

A COMPARATIVE STUDY
Chinese Theory of Poetic Meaning and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ry Meaning.

比较研究

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

吴兴明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04BWWW002

A COMPARATIVE STUDY
Chinese Theory of Poetic Meaning and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ry Meaning.

比较研究

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

吴兴明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研究: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吴兴明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301 - 22794 - 7

I. ①比… II. ①吴… III. ①文学研究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019 号

书 名: 比较研究: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

著作责任者: 吴兴明 等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2794 - 7/1 · 265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38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引言	1
----------	---

上篇 以诗意为重心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 中西比较为何要研究意义论	7
第一节 中西比较的悖谬	8
第二节 于连的突破：“迂回”与“对视”	18
第三节 “迂回”作为对中国示意方式的探索	25
第二章 以“意”论诗：中西意义论论域的草描与中国诗意论 的开端	39
第一节 以“意”论诗	41
第二节 “意”与意义	44
第三节 意义论诸维度	50
第四节 诗意论的发生：中国传统诗意论的语用转换	55
第三章 诗意的独特性：从“不尽之意”到境象论	64
第一节 诗意论的视角奠基	64
第二节 “不尽之意”	78
第三节 境象论	93

中篇 以诗言意义为重心的比较研究

第四章 言路比较一：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中国诗意论	111
第一节 研究思路：以西方为重心的比较研究	111

第二节	索绪尔的奠基和意义论的转向·····	115
第三节	形式主义的“形式”标签、陌生化与文学 的意义问题·····	123
第四节	布拉格学派与文学语言的自指性·····	128
第五节	横纵合轴和隐喻、转喻·····	134
第六节	第二涵义系统和意义的多元性·····	136
第七节	文学叙事学和意义结构·····	141
第八节	视角差异:意义领受的视角与研究的视角·····	152
第九节	意义论视角指向的恒定、漂移与知识演进·····	159
第五章	言路比较二:新批评与中国诗意论 ·····	171
第一节	文学作品:新批评文学意义论的逻辑起点·····	173
第二节	新批评文学意义论的独特内涵·····	177
第三节	语义杂多:新批评文学意义论的理论核心·····	186
第四节	语义层面的比较:“情感功能”、“语义结构”与 “诗言情”、“意象”、“境界”等等·····	192
第五节	文本意义论与作为写作术的文本形式论·····	199
第六章	言路比较三:现象学、接受美学与中国诗意论 ·····	208
第一节	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意义论·····	209
第二节	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的意义论·····	216
第三节	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文学意义论·····	255
第四节	向内还原的两条路向:晚期海德格尔与 老庄的意义论·····	261
第五节	现象学意义论与中国诗学的品鉴论传统·····	275
第六节	解释学、接受理论与中国诗学理解论的差异·····	294

下篇 诗意论比较的延伸研究

第七章	“心”的分析:中西意义论的分类学背景与传统诗意论 的知识质态 ·····	311
第一节	“心”的知识品质·····	314

第二节 中国诗意的意义质态·····	327
第八章 “兴”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兴”的意向结构及效力演变	
的语用学分析·····	344
第一节 语用、语构：“兴”作为一种活动 ·····	345
第二节 原始的“兴”：行为构成与含义意向的扭曲 ·····	348
第三节 语用转型：从“讽谏”到“兴趣” ·····	354
附录 海德格尔将我们引向何方？海德格尔热与国内文艺	
研究后现代转向的思想进路·····	361
第一节 历史契机：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	363
第二节 再度发生的持续转变：从生存价值论到 现代性批判·····	367
第三节 回返源始之域：海德格尔克服现代性危机 的思想进路·····	373
第四节 跟随的错位：对海德格尔中国运用的几点反思 ·····	379
参考文献 ·····	384
索引 ·····	394
后记 ·····	400

引言

在语言学转向(linguist turn)之后,现代西方文论对文学质性的研究一直主要是由文学意义论即对文学语言之意义特殊性的研究来承担。这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它是一种告别了意识哲学(意识中心论)之后的后形而上学式的探讨。它不同于心理学、认识论或社会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在这里,艺术本质的哲学思辨让位于文学性,对文学作为一种意识类型、精神活动内容的特殊性的研究让位于文学语言、文本之意义构成的特殊性的研究。这样的关切方向——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陌生化”到结构主义的“第二含义系统”、文学叙事学,从新批评的“内部研究”、“张力”、“反讽”到接受理论的“空白”说、“效果历史”说等等,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规范性知识探究的主要内容。与此相比较,哲学领域的意义理论——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等,却并没有将语言意义的一般理论有效地贯彻到文学领域并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学现代知识传统。普拉特(M. L. Pratt)、哈贝马斯等人将文学语用学的研究推进到对文学文类特殊性的研讨,但是,有影响力的成果并没有从这种思想脉络中产生。其间,现象学或许是一个例外。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既有对一般意义论的深入探讨,又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开启了现代哲学对语言诗性之维的精深思考。可以说,没有文学意义论在各个现代批评/思想流派中的丰富展开,就没有现代西学关于文学的庞大理论家族。

但是,国内的现代文学理论是几乎没有文学意义论的。对文学文本、语言的意义特殊性或文学性的研究一直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真正主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侧重于对文学做认识论的研究(反映论)、心理学的研究(表现论)、主体论(审美论)和功能论/社会学的研究(意识形态分析)。支配文学理论的思想工具是意识哲学或实体论、社会理论的方法。这样的情

况表明:在国内,文学理论领域要破除形而上学——尽管它只有非常短暂的历史——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然而,中国古代是有关于文学意义——准确地说是关于诗意的特殊性的丰富思考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分析的深度、进路和知识传统各不相同,但是罗兰·巴特《S/Z》式的诗意或文学的意义分析向来就是中国古代各类诗话、词话的当然领地。那些诗话、词话的杰出与否常常取决于它们在诗意品鉴/分析上的高或低。甚至从《论语》开始,中国古代关于诗意的分析品鉴就已经拉开帷幕,断断续续地闪烁积聚迄今已蔓延了两千多年。这个巨大的传统宝库显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受式批评”就可以打发掉的。只是由于20世纪以来我们长期用意识哲学/心理学的方式去分析,这份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最丰富的,最复杂、壮观、独特的诗意探究的思想财富才被遮蔽了。我们将其纳入“表现”/“再现”之类的简陋逻辑去理解,将各色内容特异、含义丰富的诗意的分析归结为几条生硬的哲学标签,最后,当我们面对“意境”、“含蓄”、“韵外之致”等等,面对浩如烟海的对诗意状态之品鉴分析的时候,竟没有勇气断定那就是关于文学性或诗意特殊性的研究……

因此,本课题的展开首先是一种去蔽的工作:将中国古代的诗意论如其所是地恢复为对诗意之各个方面、各种层次和各种方式的领会与探究。就是说,以广义意义论的眼界去打量分析,并在与西方文学意义论的比较勾连中显明它自身。

意义论:探究意义的领会、聚集、切分、传达以及对此聚集/切分的阐释和描述。它包括两个层面:(1)对意义的研究;(2)对意义意识乃至意义理论的文化传统之研究。由于诗意论深切地关涉一种文化的意义发展方向或语言之意义聚集的原始之发生,因此,本课题的展开还有第二重意义:对中西不同文化意义发展取向的探询扣问。实际上,从“(1)”到“(2)”将对意义问题的探索推向文化史的研究,推向某种文化独特的意义构成和意义理论,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列维-斯特劳斯半个世纪以前就曾经在《野性的思维》(1962)中从结构—逻辑分类的角度对印地安人等土著部落语意建构(切分)的特殊性作出过杰出的分析。但是,对中国文化,直到今天,除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用散点描述的方式研究过它与西

方不同的“意义走向”及“语意网络”(详后)的特殊性之外,正面触及它的意义论传统,尤其是它与西方意义论之比较研究的似乎很少。说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意义发展方向是一回事,说中西文化传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理论是另外一回事,而说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学、诗学意义理论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只要是谈论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诸如思维方式、知识样态、价值精神、艺术形态之类,就总是和于连所说的不同文化的意义方向、语意网络乃至对意义的理论把握密切相关。

一直以来,我们所熟知的意义理论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意义论。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只要是谈论意义的理论,就总是一种“共时”的理论,因而就似乎是一种对于意义问题的“客观”的、“科学”的西学式把握。因此,虽然早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的系列论文问世之际(写于1937—1947年,1957年结集出版),人们就已经知道中国古代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理论,但是人们关心的却是这种意义理论的“科学性”——说白了,是它与西学意义理论乃至认识论背景下的**逻辑学意义理论**之间的吻合。研究者忽视了意义理解和生活世界、文化传统的相关性,忽视了不同的意义理论是和不同文明的意义发展方向直接相关的,因而一种异质文明的生活世界完全可能发展出一种对本文明生活世界的意义有独特穿透力和解释张力的意义理论,甚至该文明传统中的某些独特的意义行为只有在这种理论的解说下才是“可以理解”和“富有意义”的。比如在中国古代特别发达的“讽喻”和作为中国人行为习惯的“迂回”(详后)。不是说西方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传统的意义行为,而是说中国的意义理论可能会更有效地解释中国文化中有些在西方理论看来很“奇特”的地方。要强调的是,与具体的意义行为常常显得“怪异”和“难以理解”不同,意义理论作为一种理性的解释系统本身是普遍性的。只要是理论,它的语述性质就是普遍性的。在中与西之间,不是一普遍,一特殊,而是都为普遍或都是特殊。相对于意义行为,它们是普遍的,相对于不同的意义论,则它们都为特殊。西学的普遍主义意义论是西方文明背景下的产物,一如中国传统的意义理论是中国文明的产物。由此,任何意义理论本身都已经被历史化、相对化了,而意义论域则开放为具有无穷可能性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有

希望根据不同的意义理论对那些极不相同的、异质文明的“古怪行为”作出意义的阐释与重构。(其实所谓“古怪”,常常就是指意义理解的陌生性而言)因此,我们也可以有希望根据某一种意义理论对不同文明的意义行为作出跨文明的解释与重构。

了然的是,对中西文明意义发展方向和意义论的比较——简言之,中西意义论的比较研究——是比对中西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度信念、思维方式一类的比较更纵深、也更为基本的比较。我们认为,从显性的观念内容及其历史形态的研究向意义论、意义机制研究的突进,应该被看做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西比较研究最重要的突破之一。这一突破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于连作出的。在这一层面,本课题的想法是:将这一突破继续往前推进,将它坐实,将它引向诗学领域,将它置于与现代西学诸种文学意义论的“对视”之中相互阐发和映衬。

本课题在结构上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展开:上篇,以中国古代诗意论为重心的比较研究;中篇,以西方现代诗言意义论为重心的比较研究;下篇,中西诗意论的延伸性研究:它的分类学和知识谱系背景,中国诗意论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当代西方诗言意义论在中国的影响研究。

上篇 以诗意论为重心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 中西比较为何要研究意义论

中西比较研究为何要研究意义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很多种陈述,比如前面所提到的为恢复中国古代诗意论的本来面目,或如通常所说的古为今用,当下借鉴之类,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中西比较学术推进的需要。在我看来,研究意义论是中西比较研究在一系列悖谬性试错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

本章力图在中西比较的题域对我心目中的意义论研究及其进路作一简要陈说。

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中西比较是重要的。中国知识的现代构成决定了中西比较之于人文学科的背景性和母题性,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对我们有效的知识言述总是在现代西学和本土传统之间展开。这样,所谓“比较”就有了两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它是一些直接以“比较”命名的专门学科的题域,比如“中西比较诗学”;其二,是涵蕴较为广阔的,几乎涵盖了所有人文学科的所谓“比较的思虑”,它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展开之得以可能的思想意识背景。在中西之间思考是现代思想的平台。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西比较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基本语境。就学统而言之,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就是说思想言述的学理根据变了,西学不只参与了中国知识的现代性构成,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导性支撑。由于如此,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基就不是“或中或西”,而是在“中西之间”,无论何种发有所据的创设性言说都总是在中西之间比较、甄辨和取舍。

问题是:在中西之间究竟该怎样取舍?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几乎是未经反省的。这种未经反省的状态从各种“以西释中”/“以中释西”的思想样式一直贯彻到某些以“比较研究”命名的学科。问题更在于:所谓“比较的反

省”一经展开,竟会呈现出一系列悖谬,以致使人怀疑所谓“比较”是否真的可能。张志扬先生说:

在中西两大壁垒的夹缝里寻找现实的立足点,即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乃是一个几近生存悖论式的难题。^①

张先生的感慨是许多真诚反省过中西比较研究的人的共同的感慨。还不敢说是在寻找“个人的真实性”,只是严肃地追问和寻求中西比较的理据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而中西比较研究从“观念”论向“意义”论^②的推进,则似乎是在这令人却步处开出的另一条路径。

第一节 中西比较的悖谬

在对中西比较之理据的追问和反思中,余虹先生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6)是做得非常之好的。他对中西比较的一系列前设及其悖谬做了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的最为深入的剖析。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指向,余虹先生的探索已显示出某种向意义论推进的端倪。

1. 同一性假设的谬误

余虹认为,20世纪对中国传统知识的研究(含比较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对中与西不同知识体系的同一性假设。研究中国的××理论史、××学史或比较中西的××学,已经前提性地断言中国古代存在着作为学科

^① 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勒口语。

^② 一直以来,对知识/理论的中西比较主要是对知识历史中的观念内涵的比较,比如“物感”说与“模仿”说,“壮美”说与“崇高”论。着力于比较不同知识之观念内涵的同异及其理据,几乎是作为思想研究的中西比较的通例,但是我们后面的分析将表明,只要是这种比较,它就一定是悖谬性的。正如于连所指出,这种比较的前提是分类。由于中西思想的“语意网络”并不相同,它们并不遵循共同的逻辑划分,甚至中国知识传统的相当部分并不看重对知识确定性内涵的明示。由于如此,比较就总是意味着一种切割。我们能够明确比较的地方常常并不是中国知识传统所注重的地方,我们津津乐道谈论的常常正是传统知识人心目中的糟粕,甚至只要我们这样去理解传统知识,我们就已经前提性地曲解了传统知识。因此,有意义的中西比较的前提是:绕行到那些“观念”的背后对中西文化中决定这些“观念”的不同“意义发展方向”的研究。由于连率先开启的中西比较的这一推进,我把它称之为从“观念”论向“意义”论的推进。

的××学或××理论,因而无论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史料做何处理,都已经预设了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西学的同一性。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中西比较诗学”的准确意指或确切表达是“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因此,当这一称谓用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时,它便暗中断定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诗学”样式了。

流行的推论是:“文论”即“文学理论”的简称,“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简称,由于“文学理论”即“诗学”,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诗学”。^①

但是,“文论”并不就是“诗学”。余虹指出:“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和‘诗学’这两大表达方式的书写样式和读音样式虽系汉语,但它们的概念语义则是经由对‘theory of literature’和‘poetics’的翻译解说而从西方译入的,它指述一套西方的思想系统和话语系统。”^②事实是:“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无法通约。”^③(同上)具体地说,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是《文心雕龙》式的“弥纶群言”,西方的“诗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专论诗艺”,即专论一部分被名之为诗性的文本言述。现代汉语中的“文学理论”一语是完全对应于狭义的“theory of literature”的。这样,就“文学理论”而言,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广义的文论(“弥纶群言”),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狭义的文论(即基于“文笔之辩”的文韵文藻之论或基于诗文之分的散文论)。就“诗学”而言,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论”。后者只是作为“群言”之一的“文类论”,只论及狭义的诗体,前者则论及最一般的“诗性”言述,在体裁上可包括狭义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体。“文学理论”如是,“诗学”如是,“美学”、“阐释学”、“符号论”、“解构主义”乃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论”、“再现论”、“文本理论”、“接受理论”等等都是这样。上述这些以汉译西学语词命名的学科和理论思潮是指称在西学历史状态中的某些学科与思想流派,它们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经验内涵和知识质态,

①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同上。

不能用来指称与之根本异质的中国传统知识。

问题在于,20 世纪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几乎大部分都是这种研究。在西学参照下的研究变成了以西学为参照标准的研究。以现代西学中的某学某说为思想标准和知识标准,前提性地对中国传统思想史材料作了选择、引申、阐释等“结构性整容”,而后纵横捭阖,大加铺扬,写成“中国××学”、“中国××理论史”或“中西××学的比较研究”。这样阐释出来的意义“总是现代西学的意义”。我们据之为出发点的“××学”在绕一大圈之后仍然是作为原点的“××学”,“中国的××学研究”只是实现了西方的“××学”视角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和穿越,“××学”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我们很容易看到:1) 这样的研究于西学的知识题域只增加了例证而不增加新知;2) 它掩盖或抹杀了中西之间两种文化体系的结构性差异;3) 它独断性地假定了作为历史形态的某些西方的“理论”(theory)和“学”(-logy)的知识样式为超历史超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知识样式。

西学学科的普遍性预设,乃是出于一种“隐秘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由于现代汉语语境的特殊构成,“美学”、“诗学”、“阐释学”之类汉译西学学科的名称原本就是,也只能是指称现代西学的学科。说 20 世纪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普遍隐含着以西学为普遍知识或真理性话语的预设,一个更直接的表征是几乎没有人以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来命名中西比较研究,或者直接对西学展开中国式的研究。比如没有人写“中西兵法论”,“西方的心性学”,“中西道术论”、“西方的帝王学/王道论”之类。关键是,西方中心论的逻辑不只是“中西比较诗学”的逻辑,根本上讲,它是中国知识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走向或者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逻辑。由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已在知识信念中将作为历史形态的现代西学认定为普遍知识或知识的真理之维,因此,所谓知识的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现代西学对本土知识的透视、化归、消解和全面替换。所谓“中西比较”并不是在理论前设上以中西双方为本位的对位性比较,而是从属于西化逻辑之“解构—化归传统”工程的一部分。

尤须提及的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学术思想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语言处境:现代汉语语义空间的二元构成。此二元构成指的是:由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由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

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这两大语义空间同时并存于现代汉语世界。^①

这样的处境注定了：有效的知识言说须在中西之间展开。它既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中心”，也不是某些港台学者所张扬的“中国（传统）中心”。不管是思想创新还是中西比较，其间种种“西方中心”语式和“传统中心”语式应该说都起于对此处境的未经反省。除这两种语式而外的许多“主义”不明的研究，更在含混不清的中西套用、错位和比附之中毫不反省自身所据以展开研究的知识系统是什么，不反省这种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随意性套用合法性何在。如果冷静地审视我们的处境，我们首先会意识到自身的学术使命：我们的确无法为古人传薪或为西学传教，我们应该做的仅仅是现代汉语思想界的学术创新；其次会意识到中西异质知识体系之间的界限、边界，由此反对“或中或西”和在中西之间的随意比附、曲解和套用，强调真正的知识创新要在中西边界处度量和取舍。余虹认为，在中西之间度量和取舍决定了：不管是狭义的比较研究还是新的学术取向，都应当诉诸寻求一个超越中西的“第三者”。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诗学都不是比较研究的立足点与坐标。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意味着双方都是被比较研究的对象，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权成为阐说对方的标准而独占这个“之间”，因此，只有在“文论”和“诗学”之外去寻找一个“第三者”才能真正居于“之间”而成为比较研究的支点与坐标，这个“第三者”当然是更为基本的思想话语与知识框架。^②

2. 现象学还原：作为“第三者”的通达之路

那么，何为“第三者”？或者说我们怎样能够找到“第三者”？余虹的方案是：走现象学的还原之路。他认为，这是比较研究在学理上是否可能的关键。

余虹的还原分两度展开。

①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